

公安派

文学思想研究

贾宗普 著



公安派

文学思想研究

贾宗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安派文学思想研究 / 贾宗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161 - 0142 - 1

I. ①公… II. ①贾… III. ①公安派 - 文学思想 - 研究
IV. ①I209.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1561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 鸣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公安派文人所处之政治环境	(4)
第二章 公安派前期文人的生态态度	(16)
第一节 公安派文人的生活情趣	(16)
第二节 徘徊于仕与隐之间	(26)
第三章 公安派前期文人的哲学与政治思想	(44)
第一节 公安派文人哲学思想的渊源	(44)
第二节 性命之学	(60)
第三节 适性	(74)
第四节 公安派文人的政治思想	(89)
第四章 公安派后期文人的生态态度	(102)
第一节 公安派文人的生态态度和思想转变的原因	(102)
第二节 公安派文人心态的变化	(115)
第五章 公安派后期文人的哲学思想	(132)
第一节 公安派文人与江右王学及其他	(132)
第二节 顿悟与渐修	(139)
第三节 显净遮禅	(149)
第六章 公安派形成期的文学思想	(156)
第一节 公安派的形成	(156)

第二节	公安派文人文学观念转变之原因	(160)
第三节	公安派形成期文人的文学主张	(170)
第七章	公安派兴盛期的文学思想	(187)
第一节	公安派的兴盛	(187)
第二节	袁宏道诗歌与民歌的关系以及公安派文人的 文学渊源	(191)
第三节	公安派文人诗文的审美风貌	(199)
第四节	袁宏道所主张的“性灵”之内涵	(215)
第五节	公安派的“无法”说和文学批评的标准	(230)
第八章	公安派蜕变期的文学思想	(246)
第一节	万历文坛的新变和公安派文人地位的变化	(246)
第二节	公安派蜕变期文人文学思想的变化	(249)
主要参考书目	(269)
后记	(273)

导 言

明代万历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各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共存。从社会状况和政局来看，一方面，商品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富裕，整个社会风气追求奢靡和享乐；另一方面，则是皇帝不过问政事，朝臣存在激烈的斗争，明王朝潜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思想上，一方面是程朱理学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士人却热衷于心学和禅学。在文学上，一方面，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颇受欢迎；另一方面，文人的诗歌与文章的写作热衷于复古，诗文中弥漫着复古风气。公安派是万历时期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个文人群体的主要人物是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他们提倡个性化写作，改变了一时风气，给当时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晚明公安派受到了学人的瞩目。新文学运动的精神本来与西方文化的传入有关，不过，有的学人开始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学运动的渊源。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就认为公安派与新文学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在周作人的启发下，任访秋先生开始研究袁宏道，并著有《袁中郎研究》一书。这部著作出版于20世纪八十年代，实际上却是任访秋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研究院读书时的研究成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公安派研究停顿了很长时间，没有取得新进展。八十年代以后，公安派逐渐成为明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热点。大量论文研究袁宏道以及公安派文人，还相继出版了五部研究公安派的著作，从不同方面对袁宏道以及公安派进行了研究。从研究著作来看，周群先生的《袁宏道评传》研究了袁宏道的生平、思想和文学主张；钟林斌先生的《公安派研究》主要是对公安

派的文学主张和作品的研究；易闻晓先生的《公安派的文化阐释》侧重于思想和文学批评的分析；尹弘恭先生的《公安派的文化精神》全面细致，尤其着重分析了公安派文人与佛学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文学观念；范嘉晨和段慧冬先生的《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对公安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台湾一些学者对公安派也有研究，如周质平先生有《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兼论袁宏道的生平及其风格》。该书是周质平先生有关公安派文人研究的论文集，梳理了公安派与复古派的关系以及公安派文人的生态态度。周质平先生没有按照个性主义的观念来审视公安派文人，更重视袁宏道的世俗的人生。除去上述已经出版的研究公安派的著作外，还有大量硕、博论文研究公安派。除此之外，一些研究晚明文学的著作也涉及了公安派，不乏精辟之论。如吴承学先生的《晚明小品》、左东岭的《李贽与晚明思潮》等著作。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公安派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研究视角逐渐地由外在观念转回到历史本身来审视。过去，外在观念对研究公安派有较大影响。如有许多论文往往以个性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来审视公安派。这样研究并非没有价值，它可以凸显公安派的意义。但个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毕竟是西方思想，有自己的背景和发展脉络，与公安派所处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以此观念来审视公安派，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与西方观念存在错位。这种研究状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改变。研究者不再从外在的观念而是按照历史本身的样态去研究，因而在公安派研究中出现了许多富有历史感的研究成果。

公安派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就公安派研究来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恰如有的学者所说，一个好的研究基础应该是非常清楚对象的时、地之关系。就公安派研究来说，公安派几个主要人物的文集都出版了，与公安派相关人物的文集亦不难寻得，但除去钱伯城先生在《袁宏道集笺校》中给袁宏道诗文做了系年之外，公安派其他文人诗文系年就没有了，这就造成了公安派研究中相关的时、地关系是非常不清楚的。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就很难论断。笔者认为非常需要有一本公安派文人及其友人的活动和诗文编年的著作。如果有这样一本著作，可以为公安派研究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除去这一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公安派文人与禅的关系的问题。禅对公安派的影响，不仅仅是观念的，而且还存有具体途径。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公安派文人到底受到

了哪些禅学著作的影响、他们对禅的理解如何，禅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等问题。如果把这些具体的问题弄清楚，也许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公安派的人生观念和文学思想。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公安派研究来说，相对于义理的诠释，追寻历史痕迹本身可能更为重要。这并不是说义理的诠释没有价值，但笔者以为古人的这些义理有许多玄学成分。这些具有玄学成分的义理作为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自有其价值，但也有许多虚妄的成分。虽然古人的这些义理对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然有很大影响，但笔者以为历史研究者所能做的，是通过古人的思考（包括他们的玄想）来看生活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的思维状态、人生观念和审美趣味。

事实上，追寻历史痕迹是非常难的。就公安派来说，公安派文人的文集并不能真实地体现出他们的存在状态，况且他们对有些事件似乎还有所忌讳，没有在文集中得到表现。比如，公安派文人牵涉了党争，并且党争影响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但是，有关党争情况在他们集子中却很少涉及，即使涉及，也是隐隐约约，反而在明代笔记和史书中略有记载。再如公安派文人思想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调整，一方面与他们思想状态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外界之政治和思想环境有尤为密切关系。如袁宏道曾提到了小根禅，小根禅与他的思想变化有关。但是，小根禅到底与当时思想界以及哪些人物有关，事实上是不清楚的。

有关公安派文人心态，从他们诗文反映出来的，有时也不真实。他们之中有的人可能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故作清高之论。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公安派文人一些归隐山林的言论可能是为了舆论、文集的出版故意为之，不一定出自本意。所以，在这种风气下，不仅要看公安派的言说，而且还要看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公安派文人心态甚为复杂，就在于他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处在各种关系之中，不可能完全地按照自我的本来面目生活。

上述问题，笔者修改完此书稿后，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并且，因为自己缺少相关知识，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如禅的问题，未作深论，所述也多属隔靴搔痒。但为了了结这份与公安派的一段因缘，故不揣浅陋，还是把它拿了出来，求教于方家，希望批评指正。

第一章

公安派文人所处之政治环境

隆庆、万历和天启三朝，政局动荡起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就与明王朝兴衰的关系以及对士人心理影响而言，当推张居正改革、神宗怠政和晚明党争。

一

明朝至正、嘉时期，因为武宗之荒唐、世宗之醮让，国势已衰。隆、万之际，明王朝一些有为之士，已认识到了明王朝的危机。他们试图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来挽救日渐衰败的王朝。

万历初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便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张居正的改革涉及明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领域。据韦庆远先生研究，张居正改革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一、整饬吏治，调整人事任免，以之为进行改革的突破口；二、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作为均平赋役，解决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基础；三、进一步巩固边防，保持北疆安宁，肃清东南‘倭寇’的侵扰；戡平内地的反抗活动；四、大力整顿司法纪律，反对法弛刑轻，坚持违法必究，‘刑期无刑’；五、全面整顿驿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六、大力兴修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国家财政经济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七、为‘整顿士风，统一舆情’，消减科举录取名额和贡、监生人数，查禁书院和讲学。”^①

^① 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页。

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首先，吏治有了很大改观，“政体为肃”。^①其次，增加了国家财力，“太仓粟可支十年，罔寺积金至四百余万。”^②最后，在军事上，巩固边备，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发展经济的环境，当时“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③。总之，张居正通过政治、经济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使明王朝呈现出中兴气象。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神宗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决定消除张居正的影响。于是，在神宗支持下，朝臣群起攻之，朝廷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倒张运动。张居正不再是有功于明王朝的改革者，而是成为了一个威福自专的权臣。神宗最初只是诏令褫夺了张居正的各种封号，两年之后，又籍没了张居正家产。一代名相成为了皇权的牺牲品。

神宗亲政，大权独揽，但不久就发现在现有体制下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他认为，许多大臣提出各种建议，不是出于公心，也不是为了国事考虑，而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和声名。于是，神宗的执政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厌倦枯燥乏味的君王生活，不理政务。黄仁宇先生认为，神宗执政态度转变，大概始于万历十四年。^④自此之后，神宗不郊不庙几十年，清醒、理智地躲在深宫中，看着明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神宗怠政表现之一是缺官不补。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缺官不补”条载：“万历末年，殆荒日甚，官缺多不补。旧制，给事中五十馀员，御史百馀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与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从哲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视事。帝恶言者扰聒，以海宇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方从哲传》今按叶向高疏言，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④ 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页。

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又言今六卿止赵焕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补。《向高传》又孙玮为户部尚书，时大僚多缺，玮兼署戎政及兵部。又都御史自温纯去后，八年不置代，至外计期近，始命玮以兵部尚书掌左都御史事。《玮传》御史孙居相一人兼摄七差，署诸道印。《居相传》观此可见是时废弛之大概也。”^①神宗如此行为实不可思议，其出于何种动机，曾有许多人进行推测。有人认为是神宗吝啬，以为如此可以省去官员的俸禄；有人认为是出于神宗懈怠。事实上，不管神宗的动机如何，其怠政的结果是使政府陷入了瘫痪状态。政府丧失了正常的功能，不能正常运作，根本无法应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事实上，神宗怠政，却没有放弃权力。他曾说：“朕亲览奏章，何事不由独断？”又说：“如今用人，那一入不是朕主张。”^②神宗的懈怠、冷漠的态度，也有仿效其祖父世宗无为而治的意味，玩弄所谓的君王南面之术。另一方面，神宗疯狂而贪婪地聚敛钱财。他把大批中官分派到各地，担任矿税使，盘剥渔猎百姓。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富民，皆不能逃脱中官的魔爪。^③神宗敛财对明王朝的危害极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老百姓一次次激烈的抗争，动摇了人心和经济基础。可以说，神宗的贪欲不仅彻底毁掉了张居正的改革成果，而且也使明王朝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最后机会。

万历朝士人对神宗敛财行为固然有强烈不满，但神宗的麻木更让他们忧虑。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五载：“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卷而封之。予尝称圣明宽度，具知情状，有当事大臣所不及者，而太宰宋公独愀然曰：‘此反不是。时事得失，言官须极论，正要主上动心，宁可怒及言官，毕竟有惊省，今若一概不理，就如痿痹之疾，全无痛痒，无药可医矣。’同列皆服其言。此后数年，百凡奏请，一切留中，即内阁密揭，亦报不闻，而上下之交日隔矣。回忆此公之言，为之三叹。”^④宋公，即宋纁。《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宋纁本传亦载：“中外陈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辄曰：

① 赵翼著，黄汝成校点：《廿二史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神宗实录》卷一八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版。

③ 参见赵翼著，黄汝成校点《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条。

④ 于慎行著，吕景琳点校：《谷山笔麈》，中华书局1984年版。

‘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称帝宽大。繻愀然曰：‘言官极论得失，要使人主动心，纵罪及言官，上意犹有所做省。概置勿问，则如痿痹不可疗矣。’后果如其言。”

从当时朝臣的奏疏看，他们最初还对神宗抱有一点点期望，试图劝谏神宗能够罢除矿税。如赵士卿在奏疏中说：

今日实政，孰有切于罢矿税者。古明主不贵异物，今也聚悖入之财，敛苍生之怨，节俭之谓何？是为君德记，不可不罢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将海盗。鹿台、钜桥，足致倒戈之祸。是为宗社计，不可不罢者二。古者国家无事则预桑土之谋，有事则议金汤之策。安有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挟矢，戕及良民，毁室逾垣，祸延鸡犬，经十数年而不休者。是为国体计，不可不罢者三。貂珣渔猎，翼虎兇然。毁掘冢墓，则枯骨蒙殃；奸虐子女，则良家馀恨。人与为怨，讙噪屡闻，此而不已，后将何极。是为民困计，不可不罢者四。国家财赋不在民则在官，今尽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绌，稽关税而关税亏，搜库藏而库藏绝，课盐荚而盐荚薄，征赎醵而赎醵消。外府一空，司农若埽，是为国课计，不可不罢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是为诏令计，不可不罢者六。

陛下试思服食官室，以至营造征讨，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无负于国，乃民方欢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劳，而陛下不少慰其劳；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难，而陛下不少恤其难。返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谓蠢蠢小民可驾驭自我，生杀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今天谴频仍，雷火妖虫，淫雨叠至，变不虚生，其应非远。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罢矿税，无烦再计而决者。^①

万历朝臣不断上疏劝谏，但无论朝臣采用何种激烈的言论来提醒、警示、刺激神宗，神宗始终以冷漠麻木的态度应付之。当时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积累起来，内忧外患，明王朝实潜藏着巨大的危机。面对如此现实，朝

^① 《明史》卷二百二十。

臣劝谏无果，只好清醒地看着明王朝走向崩溃。无奈、焦虑、狂躁和绝望，成为了万历一朝士人的典型心态。

万历朝士人这种心态在一些朝臣的奏疏中已表现出来。如吕坤在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极陈天下之安危，指出神宗怠政和敛财是造成如此乱象的根本原因。他说：“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①接着，吕坤直陈万历之怠政和敛财的危害。首先，导致了民生的贫困。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狼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其次，国家财用耗竭。他说：“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木费，又各几百万矣。土不加广，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涌金，安能为计。”^②其三，使国家边备松懈，防御疏略。他说：“三大营之兵以卫京师也，乃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边之兵以御外寇也，皆勇于挟上，怯于临戎。外卫之兵以备征调资守御也，伍缺于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仅存，折冲悉赖。设有千骑横行，兵不足用，必选民丁。以怨民斗怨民，谁与合战。”^③最后，吕坤认为神宗敛财，已经招致了百姓的怨恨，失去了民心。他说：“臣观陛下昔时励精为治，今当春秋鼎盛，曾无夙夜忧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贫为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又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藟愁叹，难堪入听。陛下闻之，必有食不能咽，寝不能安者矣。”因此，吕坤希望神宗罢黜各种弊政，收拾人心。他说：“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④从疏中可以看出吕坤对明王朝存在的弊政以及所处之危局，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故他在疏中直指神宗，丝毫不留情面，希望神宗能够有所省悟。

朝臣屡屡上疏陈奏，言辞愈来愈激烈，可神宗却毫无反应，往往不了

①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了之。朝臣对神宗这种类似无赖的行为愈来愈烦躁，终至于绝望。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借用异常的天象来威胁神宗。如万历二十七年，狄道山崩，下成池，山南涌大小山五。杨天民上疏说：

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间有之，而唐遂易为周。今虎狼之使吞噬无穷，狗鼠之徒攘夺难厌。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银。甚且毁庐坏家，籍人资产，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欢，藉润私橐。嗷嗷之众，益无所归命，怀乐祸心，有土崩之势。天心仁爱，亟示谴告，陛下尚不觉悟，翻然与天下更始哉？^①

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灾。马孟祯又借此劝谏说：

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具废，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其彻御览与，果出圣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虑也。臣子分流别户，入主出奴，爱憎由心，雌黄信口，流言蜚语，腾入禁庭，此士习可虑也。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比岁旱饥。民间卖儿鬻女，食妻咬子，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一呼四应，则小盗合群，将为豪杰之藉，此民情可虑也。^②

马经纶在疏中威胁说：“夫人君受命于天，与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无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职，无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万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讲、不惜才、不贱货，咎失人君之职，而赫然降非常之灾，不知陛下尔时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独不思自为社稷计乎？”^③ 神宗听不进朝臣任何意见，故马经纶不惜以天命威胁神宗，希望能够触动处于麻木状态中的神宗。神宗甚为愤怒，但仅仅贬其俸禄而已，内心并无一点点触动，依然我行我素。

《明史》编纂者在评价这些士人的奏疏时说：“神宗中年，德荒政圯。

①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② 《明史》卷二百三十。

③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怀忠发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词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讪摩上，君子弗为。谓其忠厚之意薄，而銜沽之情胜也。锥于仁、马经纶诋讥讪让，几为侪偶所不能堪矣。圣人取讽谏意者，殆不如是乎？”^①认为他们言辞过于激烈，有违主文谏的为臣之道。事实上，这些士人的奏疏，言辞激烈，不惜危言以耸视听，乃是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反映出他们对神宗彻底绝望的心理。

二

神宗的怠政行为对万历朝士人有很大影响。许闻造说：“陛下顷岁以来，谓公忠为比周，谓论谏为激扰，诎权衡之所贤，扰刑官之所执。光禄太仆之帑，括取几空；中外大小之言，县缺不补。敲扑遍于宫闱，桁杨接于道路。论救忠良，则愈甚其罪；谏止贡献，则愈增其额。奏牍沉阁而莫稽，奄寺纵横而无忌。今欲摘陈一事，则虑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则虑陛下益罪其人。陛下执此以拒建言之臣，诸臣因此而塞进言之路。诸臣谗谀之风，视昔太沮矣。”^②神宗屡屡否定大臣建议，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用自己的行为消解了士人的价值观，造成了万历朝政局的混乱。

万历朝政局混乱有多种表现，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党争。

明代党争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一些有关党争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我们在此仅仅讨论晚明党争对万历朝士人的影响。

明朝党争不始于万历，嘉靖朝已初露端倪。《明史》卷二百十五说：“嘉靖之季，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无当，与其心之不能无私；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也。”吴应箕《东林本末》说：“昭代之党祸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故自张凤盘（名四维）以前，溯而上之，如张太岳（名居正）、高中元（名拱）、徐存济（名阶）、严介溪（名嵩）、夏桂洲（名言），其权专，

^①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②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其党同伐异，显行于好恶之间，而人莫之敢议。”^①

事实上，嘉靖朝以及万历初，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即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如高拱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与各部以及言官存在着矛盾。他为了维护自己权威和推行自己的主张，经常利用门生故旧攻击不同意见者。《明史》卷二百十五载：“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势烜赫。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这种争斗固然有权利的争夺，主要还是因为双方政见不同。并且，内阁首辅有些问题不能在体制内得到解决，故有时也不得不利用私人关系，求助于同好的力量。如张居正推行改革，有时即是通过私人关系和言官的力量，来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到了申时行任首辅时期，阁臣与言路矛盾更加突出。这种状况与神宗的态度有关。神宗利用言路清除了张居正的影响，却不希望言路干预时事。同时，内阁多听命于神宗，故与言路也有许多矛盾。《明史》卷二百十八载：“四维忧归，时行为首辅。余有丁、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先后同居政府，无嫌猜。而言路为居正所遏，至是方发舒。以居正素昵时行，不能无讽刺。时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虽乐言者讦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间谪官。众以此望时行，口语相诋谩。诸大臣又皆右时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愤。时行以此损物望。十二年三月，御史张文熙尝言前阁臣专恣者四事，请帝永禁革之。时行疏争曰：‘文熙谓部院百执事不当置考成簿，送阁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当一一取裁；督抚巡按行事，不当密揭请教；阁中票拟，当使同官知。夫阁臣不职当罢黜，若并其执掌尽削之，是因噎废食也。至票拟，无不与同官议者。’帝深以为然，绌文熙议不用。御史丁此吕言侍郎高启愚以试题劝进居正，帝手疏示时行。时行曰：‘此吕以暧昧陷人大辟，恐谗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书杨巍因请出此吕于外，帝从巍言。而给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时行意，蔽塞言路。帝寻亦悔之，命罢启愚，留此吕。时行、巍求去。有丁、国言：‘大臣国体所系，今以群言留此吕，恐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尤不胜愤，专疏求去，诋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陆光祖亦以为言。帝乃听巍，出此吕于外，慰留时行、国，而言路群起攻国。时行请量罚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东之以大峪山寿宫事撼

^① 吴应箕：《东林本末》，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时行不胜，贬去，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申时行对言官的攻击，往往隐忍退让，故此时内阁与言路虽然存在激烈的矛盾，但还没有形成朋党。

沈一贯担任内阁首辅时期是明代党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党争主要特点有二：

其一，形成了朋党。

《明史》卷二百十八载：“帝自疾瘳以后，政益废弛。税监王朝、梁永、高淮等所至横暴，奸人乘机虐民者愈众。一贯与鯉、廉共著论以风，又尝因事屡争，且揭陈用人行政诸事。帝不省。顾遇一贯厚，尝特赐敕奖之。一贯素忌鯉，鯉亦自以讲筵受主眷，非由一贯进，不为下，二人渐不相能。礼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气节著，鯉甚重之。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皆以清严自持相标置，一贯不善也。会正域议夺吕本谥，一贯、廉与本同乡，寝其议。由是益恶正域并恶鯉及纯、时乔等，而党论渐兴。浙人与公论忤，由一贯始。”到了万历中期，言官也分出党派，形成了东林党以及与之相争的齐、昆、宣三党。

其二，党争趋向于激烈和复杂化。

沈一贯为了维护自己权势，对那些触犯自己利益者，往往不择手段地进行攻击。如在“妖书案”中倾陷沈鯉、郭正域，如其驱逐温纯，等等。因“妖书案”后文还要涉及，故在此仅以浙党驱逐温纯为例说明之。

温纯是东林党中一人物。《明史》卷二百二十说：“纯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时称名臣。”温纯因弹劾龙楨、于永清而牵涉沈一贯，故引来了浙党弹劾和攻击。《明史》卷二百二十载：“先是，御史顾龙楨巡按广东，与布政使王泮语不合，起殴之，泮即弃官去。纯劾罢龙楨。御史于永清按陕西贪，惧纯举奏，倡同列救龙楨，显与纯异，以胁制纯，又与都给事中姚文蔚比而倾纯。纯不胜愤，上疏尽发永清交构状，并及文蔚，语颇侵首辅沈一贯。一贯等疏辨。帝为下永清、文蔚二疏，而纯劾疏留不下。纯益愤，三疏论之，因力丐罢，乃滴永清。纯遂与一贯忤。给事中陈治则、钟兆斗皆一贯私人，先后劾纯。御史汤北京不平，疏斥其妄。纯求去，章二十上，杜门者九阅月。帝雅重纯，谕留之。纯不得已，强起视事。及妖书事起，力为沈鯉、郭正域辨诬。楚宗人戕杀抚臣，纯复言无反状。一贯怨益深。”又载：“三十二年大计京朝官。纯与吏部侍郎杨时乔主之，一贯所欲庇者兆斗及钱梦皋等皆在谪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责，尽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纯求